

文化振兴视角下扶贫扶志理论思考与政策创新

◇ 田丰韶

随着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向纵深推进,有关扶贫脱贫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部分地区贫困人群“等、靠、要”思想较为突出,“志”和“智”存在短板成为制约脱贫致富的瓶颈。扶贫扶志成为当前扶贫工作亟需解决的理论问题。

一、贫困文化:理解扶贫扶志的理论视角

(一) 贫困文化本质界定

在贫困的社会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两种视角。长期以来,在中国农村贫困的社会解释是以阶层结构、城乡结构为主要观点的结构解释占据主导地位,而文化解释较多的观点则存在于人类学与文化学相关研究之中。“文化解释”认为,文化就是致贫因素,更是经济贫困的文化后果。它是一种贫困人群生产生活自我维护的精神文化体系,是贫困人群所具有的与主流文化不同的生活态度与方式。“贫困文化”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他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亚文化,是贫困人群对其社会结构地位的反映,结构形塑文化,文化延续结构。从“管理贫困”的角度来讲,贫困文化是一种滞后于社会发展的文化,难以改变而最终成为脱贫致富最根本的阻力。

(二) 贫困文化的表现形式

文化既包括价值观与行为规范,又包括外在符号、物质;既表现为物质文化,又是一种精神。所以,贫困文化表现形式异常多元。在西方学者眼中,贫困文化主要表现为个人主义、传统主义、神秘主义等。就我国长期存在的贫困文化而言,主要表现为自我改变与脱贫致富动力不足,具体为悲观、消极、安于当下、对知识与教育不太重视、怀疑、敏感与自卑、不合理消费。在扶贫方面,则是“等、靠、要”的福

利依赖。

(三) 贫困文化的产生原因

解释贫困文化产生的原因有4个理论传统:

1. 结构主义解释,即贫困文化作为贫困亚文化形态,其产生的根源依然是结构的不合理,是贫困人群对结构适应的一种理性选择,并非不理性,而是非常有必要的。贫困文化是贫困人群心理平衡的一种内在机制,是在面对低下的社会地位与难以改变的社会结构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在长期的贫困恶性循环与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地缘结构状况下,各种资源信息难以抵达贫困人群生产生活当中,长期的外在歧视偏见及各种社会排斥,使得贫困人群处于自我隔离与被动隔离之中。在面对发展援助机遇时,往往因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储备不足充满着强大的风险意识而造成迷茫、怀疑、恐惧与困惑。对财富的渴望让他们逐利,对风险的担心让他们观望与逃避,只能寄托于偶然改变。

2. 文化中心主义。贫困人群会站在自身立场上以本群体的亚文化理解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认为自我群体文化是优越的,从而怀疑甚至反对主流文化与外来文化,认为是在忽悠他们。

3. 亚文化的传承与习得。在上述两个因素下,贫困人群就成为了自我循环的封闭文化系统,在代际传递的时候不断地固化,进一步影响了贫困人群后代对改变贫困的态度,使之更加贫困。

4. 制度主义解释。主要在各种减贫与发展政策,往往以输血式扶贫、建立社会保护体系等制度体系,忽略能力扶贫。而在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造血式扶贫政策环境下,往往忽略贫困人群自我发展的主体地位,认为他们愚昧、无知、能力匮乏等,造成

很多的制度排斥。比如,当前精准扶贫给钱给物现象突出,养成了当地群众严重的依赖思想,安贫享贫,一蹶不振,造就了一批“懒汉村”,“等、靠、要”的思想越来越严重。救助兜底与扶贫优惠,逐渐养成了他们的“福利依赖意识”,期待从外在扶贫主体获得更多,从而成为他们贫困延续的主要内因。

二、扶贫扶志:扶贫开发效果的动力与智力依赖

扶贫扶志是更深层的一种扶贫视角,目标是激发贫困人群摆脱贫困的内在动力。只有使贫困人口具有内在改变的力量,才能更好地将现有精准扶贫政策效果达到最优状态,保证精准脱贫的持续性。

(一)扶贫扶志有助于催生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扶贫扶志扶什么?主要是志气与精神状态,而背后则是认知、判断与行为规范,主要通过精神改变、文化塑造、教育投资来实现。总体来讲,扶贫扶志主要采取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精神扶贫等方式改造贫困文化,推动亚文化转向文化变迁,将扶贫攻坚引向纵深。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有助于引导扶贫过程中贫困人群行为走向积极、乐观,并正确理解扶贫政策与扶贫资源,不等、不靠、不要,反观自身,弃旧图新,自我革命,从而巩固与促进资金扶贫、技术扶贫、项目扶贫、硬件扶贫的效果,消除需求不明、期望不正、利益诉求不当,减少精准扶贫政策执行难度。

(二)扶贫扶志是扶贫开发效果持久的基础

首先,扶贫扶志有助于转变贫困人口的思想观念。精准扶贫的目标在于精准地可持续脱贫,最终让贫困人群生计可持续改善。摆脱贫困,首先要破除贫困人口头脑中的陈旧观念,树立现代意识。扶贫扶志的有机结合,助推贫困人群强大的脱贫志向,激发贫困人群的个体、家庭、社会责任,激发起内在脱贫致富动力。中国减贫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开发式扶贫,实现由输血向造血转变。而造血功能的实现不仅需要资源投入、机会增加,更需要创造条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方法,把握机会,破除发展的思想藩篱。没有思想认识的提高、观念的更新,没有贫困人群自我脱贫的斗志和决心,精准脱贫效果就无法可持续。

其次,扶贫扶志有助于为贫困地区脱贫提供智

力支持。只有有了斗志与勇气,才能着眼于自我学习,实现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才会克服各种困难与障碍。总之,扶贫扶志从根本上解决了新理念影响、新信息采用、新技术推广背后动力动机问题,在更大范围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第三,扶贫扶志有利于贫困地区及贫困人群全面均衡健康发展。由于扶贫扶志不是单一地就扶志抓扶志,而是把文化服务供给、教育体系全面化、科学普及与技术推广等,与贫困人群的社会资本建设、价值观引领、良好社会心态引导有机结合,从而带来乡村全面振兴。

三、文化振兴视角下扶贫扶志的政策创新

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思想指引下,不少地方在扶贫扶志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典型经验。其主要采取精神文化扶贫宣传、树立脱贫致富先进典型,举办脱贫攻坚专项文艺演出,借助营造新乡贤文化,修订村规民约等具体举措,催生贫困人群积极的精神动力和行为倾向。不过,这些做法是狭义上的扶贫扶志,即“扶志就是通过思想教育,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脱贫致富的志气,增强摆脱贫困的信心。也就是激活内因,把贫困群众脱贫之志气扶起来,增强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是,要从根本上进行扶贫扶志,必须摆脱就事论事的扶贫扶志思维,应该以乡村文化振兴为目标导向,以扶贫政策送到位用到位为抓手,以转变农民观念为扶贫扶志的根本,以发展新时代农民教育为手段,以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为阵地,以强化党和政府职能发挥为保障,实现扶贫扶志的政策创新。

(一)以文化振兴为导向创新扶贫政策与方式方法

当前,在强大的压力下,不少地方出现了运动式扶贫,追求快速脱贫,导致输血式扶贫多,造血式扶贫少的问题。单纯地给贫困人群送钱送物,导致贫困人群更多地将扶贫工作理解为福利,从而导致贫困很光荣、致富无好处。扶贫扶志要以实现贫困地区、贫困村文化振兴为目标,“向农村等地区的贫困人群输入新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传授适用科技,并开拓交通,输入各方信息,从整体上提高贫困人群的素质,让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双手和大脑,使当地的潜在财富转化为现实财富”。应通过乡村文

化振兴战略的实施实现心态改善,提升贫困人群科技素养、规范意识、市场意识、全球化思维、敢于创新创业就业品格,为扶贫攻坚乃至乡村振兴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以完善扶贫政策运行机制为抓手

目前,精神贫困往往与政策执行有很大关系。比如,精准扶贫考核对象主要是扶贫干部,缺乏对贫困人群的考核,导致贫困人群享有权偏大而责任义务偏少。参与式扶贫不足,造成不少地方贫困人群自我发展意识不强,主体责任不足。要借助政策宣传与实施,让群众在理解政策、享受政策的过程中增强自信心、责任心和主体意识,通过党员干部作风建设,以真抓实干增强群众脱贫的信心。改进帮扶方式,提倡多劳多得,营造勤劳致富、光荣脱贫氛围。实施参与式扶贫,做好信息公开与监督检查,在扶贫各个环节中做到赋权于民。在村庄发展规划、贫困户发展规划及具体扶贫项目的设计、规划、实施、监管和验收过程中,确立他们的脱贫致富主体地位。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方式,将参与式扶贫理念和工作方法贯穿始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性,增强群众在扶贫扶志中的存在感、参与感与成就感,真正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发展”的转变。

(三)以转变贫困人群观念为扶贫扶志根本

树立“治穷先治愚,扶贫先扶人,扶贫先扶志”的理念,把扶贫扶志作为未来扶贫攻坚的重要工作。培育贫困人群精神自救、文化自觉的意识。用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满足精神需求;借助图书、大众传媒等文化载体,对贫困人群进行思想教育,培养他们的责任感;针对他们的“自我藩篱”,有针对性地加以引导,大力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促进乡风文明。

(四)以教育文化扶贫为手段

长期以来,教育扶贫主要着力于学校教育,而缺乏对农民继续教育的政策设计。文化扶贫往往是自上而下,满足任务需要。扶贫扶志的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传统理念和方式往往并不成功。其实,非正

规教育培训、边干边学、民间形式等人类传承文化知识和发展技能的主要方式往往更有效果。

(五)以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为阵地

“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已成为凝心聚力的发力点、脱贫攻坚的培训室、同步小康的助推剂。”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使命,就是围绕农民这个群体,宣讲新形势新政策,宣传新思想新做法,传播新民俗新风尚。用好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要坚决抛弃思想灌输式讲授方式,建立宣讲、研习机制,采取互助学习、参与讨论,讲好身边案例与故事等贫困人群容易接受的方式方法。通过新时代农民讲习所传播新思想,让贫困群众建立对生活与发展的信心,向群众宣传讲解党的方针政策,进行政策程序的解惑释疑。传播典型事迹,分享脱贫致富经验,让那些贫困人群找到榜样和努力方向,营造脱贫致富光荣、懒惰贫穷可耻的社会氛围。开展劳动技能培训,最终达到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新政策以及在增强素质中,提高其脱贫致富能力和本领。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满足民众精神娱乐需求,提升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吸引力和粘性。

(六)以强化党和政府扶贫扶志职能发挥为保障

扶贫扶志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对贫困文化的全面干预,涉及对整个乡村全面治理。要发挥考核指挥棒导向,将精神扶贫、文化扶贫、贫困人群思想政治状况与精神状态列入各项评估指标之中,增大考核比重,助推党和政府职能发挥。强化党和政府在扶贫扶志方面的投入,引导政府、企业与社会力量关注扶贫扶志议题,鼓励与引导多方力量进行物资、智力等的投入,搭建扶贫扶志的多元主体权力架构、治理关系、合作方式及体制机制等,建立有效的有针对性、实用性、互动性的参与式扶贫扶志工作体系。

作者简介:田丰韶,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摘自《改革与开放》2018年第19期)